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外交经验

□ 刘庭华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它在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思想指导下，表现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少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

“弱国无外交”，是指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弱国没有外交主动权，而只能按照强国的意志行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大而弱的国家，因而，如何在世界争取道义的支持，在列强之间巧妙周旋，权衡利害，因势利导，以实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目的，是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据此，中国外交贯彻了淡化国家间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政治制度的差别，以抗日为目的，同国际上一切反日力量建立和发展关系。国民政府宣称：“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朋友。”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一个执政党，不存在国家关系问题，但早已懂得并在实践中发展对外关系应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即提出，应与一切反日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1937年5月，中共中央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全国抗战爆发后，又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相协定。”总之，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共同之点是，都力争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着眼于孤立和打击日本法西斯。

联苏抗日 争取军援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特别是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直指苏联，又客观上促使苏联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尽管中苏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基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判断，联苏抗日，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针。

1932年2月，中国就向苏联提出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1933年底，中国政府主动恢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中苏邦交。之后，国民政府频繁向苏联派出军事、教育、艺术等多种代表团出访莫斯科。1935年12月，蒋介石派陈立夫、张冲秘密访苏，商谈“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个中苏互助条约”。1937年春，苏联允诺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武器援助。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苏即于8月21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美、英、法等国对日采取所谓“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政策时，苏联是当时世界诸强中唯一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国家。从1938年至1940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贷款。此外，国民政府通过谈判，还获得了苏联局部暗中出兵参战的军事支持，如苏联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训练，并直接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对日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0余人，他们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兰州等城市的空战，其中200余人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

在这之后，苏联为避免在遭德军进攻时东西两面受敌，曾于1941年4月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宣称“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无疑对中国抗战产生负面影响。但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又大大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进程。总之，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与美英结盟 扩大外援

美国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盟国和支持者之一。美国援华的特点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才逐步改变对日妥协的政策；看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持久抗战，认识到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后，而逐步加强援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美国政府采取所谓“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政策，不但不给中国抗战必要的援助，相反，却允许其企业和公司继续卖给日本大量钢铁、石油、机器设备等战略物资。1940年9月，德、日、意签订军事同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才发生了较大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与美国结盟、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外交活动，使美国的援华大为改善。1941年4月，罗斯福签署命令批准美国军人可以辞职加入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帮助中国与日本空军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实现“先欧后亚”战略，需要中国在东方拖住日本，因而才成为中国抗战的坚定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援外租借物资共485亿美元，其中英国所得占63.71%，苏联所得占22.76%，中国所得只占1.8%，约7.48亿美元。

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较苏、美等国少。全国抗战开始时，英、法采取牺牲中国权益的对日妥协政策，对中国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回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一直难于达成共识。法国在1938年曾给中国提供铁路借款。1941年后，英国从维护远东殖民利益出发，才开始重视中国抗日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虽然给过中国一点借款或贷款，但这完全只是表示一点意思而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两国才在远东成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友，中英两国军队在缅甸共同对日军进行了殊死作战。

延缓德日联盟

中国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大局考虑，利用德国政府担心日本扩大侵华反而会助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心理，纵横捭阖地开展外交工作暂时维持中德关系，从而中立德国，阻缓德国迅速倒向日本，不使为敌。在中国抗战之初，德国决定保持中立态度，并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火供应。据统计，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的16个月中，平均每月仍有3.6万吨德国军火经香港运入中国，占中国进口军火总数的60%以上。直至1940年9月德日意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后，中德两国遂绝交。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各国人民相互支援、共同战斗所取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得到过有关国家和人民的援助，但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不畏强暴，独立坚持持久抗战，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过程，研究世界主要大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和苏、美、英、法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前后不同，有一条共同铁律，即各国均以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不把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深思和借鉴。

有所思

忘记苦难可招致未来灾祸

——缅怀先父梅汝璈法官

□ 梅小璈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对在艰苦卓绝的正义事业中作出牺牲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梅汝璈法官。

止谤莫如自修

1945年，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先后战败投降。中国人民经过惨烈的抗争，付出死伤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终于和全世界人民一起，赢得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硝烟散去，百废待兴。摆在进步人类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算战争罪行，追究侵略责任，以警示后人，维护全世界的持久和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的。根据《波茨坦公告》和经过当时中国政府同意的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精神，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宣布设立法庭，审判被指控以个人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破坏和平罪行的远东（亚太）地区主要战争责任者。先父当时年仅42岁，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代表中国，与其他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一起执法东京。

先父出身农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中，先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业内口碑颇佳。这应该是他担负沉重使命的先决条件。

在不少人看来，战胜国派出代表，去处理战败国的问题，应当不会遇到太大困难——所谓法庭，所谓审判，大概仅仅是形式。然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战争胜负已定，中国已跻身五强，但仍然经常遭到歧视，其权益经常被忽略，甚至连它在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也会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先父到达东京后，与他人的第一场争论，不是发生在审判中，而是发生在审判前，发生在法官座次问题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人威勃，擅自决定把美、英两国法官在审判席上的座位安排在他自己的座位两边，而把中国和其他国家法官的座位向外推，大有讨好英美的意味。先父当即提出抗议，并脱下法袍，退出开庭预演。威勃庭长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名义相威胁，指责先父“妨碍中美关系”。先父严肃申明：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不是按照接受日本投降时的签字顺序，也不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排列顺序，又不是按照国名字母先后顺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先父坚持主张按照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法官座位，得到多数法官赞同，麦克阿瑟也没有表示反对。最后，中国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威勃庭长左边，仅次于美国法官而高于英、法、苏。先父认为，争座次不是小题大做，不是张扬自我，中国法官的位置高低实际上涉及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该不该得到、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

此番“座次之争”，中国方面固然大获全胜，可是，中国为什么总是受排挤、被轻视？先父在日记中写道：“身处国外的人，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止谤莫如自修’，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各国派来的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他决心用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诺言。“争气”“自修”“郑重”，正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品格。

必须对国人有所交代

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先父都表现出极强的原则性。他坚决反对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需要而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主张，明确指出《波茨坦公告》关于允许日本选择天皇制度的承诺，与起诉作为战争决策者之一的裕仁之间并无矛盾，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波茨坦公告》并未授权任何人去袒护战争责任者，麦克阿瑟也不能例外，天皇裕仁不能免责。对于那些喧宾夺主、鼓噪拖延的辩护律师，先父协助威勃庭长，不失时机地予以斥退乃至开除，以维护法庭秩序。随着审判的进行，中国检察官在提取证据、反诘被告方面大有起色，扭转了被动局面，先父对此深感欣慰。一个受害最深的国家，如果不能作出有力的指控，将直接影响判决的公正性。先父和中国检察官们都曾表示，假如正义得不到伸张，假如不能对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亿万同胞——包括生者与死者——有所交代，便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唯有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事情并不像多数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法庭认定25名被告有罪，那么，对他们应该适用何种刑罚？法官之间分歧较大。法庭由11国法官组成，其处境、背景、关注点迥异，各国遭受侵略程度也大不相同，此前又没有规定统一的量刑标准，因此法官们在量刑问题上意见不一并不奇怪。先父忧心忡忡，对法庭判决能否公正、能否体现中国人民的诉求十分忐忑。他不顾恫吓，不惧掣肘，不遗余力地与法官们磋商乃至争辩，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甫过四旬却已花白了头发的先父终于促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名战犯绞刑；其余18名战犯，判处16名无期徒刑，2名有期徒刑。

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此后，先父谢绝了当时政府“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的任命，于1949年底由香港秘密抵达北京，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并被推选为外交学会常务理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作为法律界和外交界的代表，他在那几年经常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尽管在1957年以后的日子里，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一如既往地发表批评日本右翼势力的文章，并为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做了大量准备。后因“文革”发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只完成了一半。1973年4月23日，先父在北京溘然长逝。

198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先父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完成稿，这半部著作后来曾数次再版，被有关专家称为“一本很有分量的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战犯审判的专著”。几次再版，编者无一例外地附录了一篇文章，即先父发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此文述及他所掌握的相关史料，也包括他记忆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主要责任者松井石根的情况。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写出了那段被广泛引用的话：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今天，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我们看到日本某些政客试图否认侵华战争罪行的乖谬举动，看到所谓“新安保法”的消极影响，看到由此而引发的两国关系中某种不确定因素。唯其如此，先父梅汝璈法官生前的告诫才显得那样意味深长：“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怯懦。”

史镜

中华春秋

抗日战争给中国留下的宝贵遗产

□ 张太原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这句话，对观察抗日战争于中国的发展进步同样适用。日本发动的凶恶暴虐的侵华战争，对我们这个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跌入灾难的谷底。但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随之而来的威武雄壮的全民族抗战，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伟大的现代性的洗礼和奠基性的民族重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新征程。此为至理。

放大历史的视野，不难发现，抗日战争的确给中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

第一，形成了不可征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牢固信念。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曾经屡战屡败，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逐渐形成了怯外心理，凡遇有中外冲突，多以妥协求和告终。通过侵略获得种种特权的西方在华人员，总是以一种优胜民族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污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或“劣等民族”。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立存于现代世界的信心。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扭转了中国人的感觉和认知。顽强的抵抗和无数的牺牲，不但向世界而且向自己证明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如果再有谁想侵害中国的主权或欺压中国人，都是不可容忍的。这样一种坚定信念树立起来了。

第二，由一个风雨飘摇的弱国走向了一个对世界有担当的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顽强抗击日本侵略的国家，向全世界展现了不畏强暴的决心和精神，树立了为尊严和独立而战的榜样，对亚非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实际上最终改变了旧有的国际关系。历史记载和后来研究都表明，中国人不但是为自己的美好未来而战，而且是为一个美好世界而战。当时中国与美国、苏联和英国进行了切实合作，中国战区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结晶。与盟军协同作战，甚至在关键时候舍己为人，充分表现了中国对世界负责的精神。同时，中国还积极支援和帮助一些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安南（越南）、泰国、缅甸、朝鲜等，体现出推己及人的世界关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国际会议的召开和一些国际宣言、文件的发表往往是由中国率先提出的，并由此最终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在中国人看来，要实现战后世界的永久和平，必须建立一种公正、平等和友好的新型国际关系，因而作为重要的发起国倡导和参与了联合国的创立。自此，一种新的亚洲和世界格局形成，如果有谁想来改变这种格局，绕过中国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国家主权和领土得以恢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版图。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武装侵略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强开租界、割占土地，损害中国主权。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不断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这一愿望终于在抗战期间实现了。它不是缘于有关国家的恩赐，而是基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1942年10月，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并就此立时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1943年1月，中美、中英在平等原则上正式签订新约。其他在中国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也相继跟进。自此，中国基本上恢复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享有的平等和独立的法律地位。

关于日本方面，1943年12月，中、美、英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规定，务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钓鱼岛历史上一直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自然包括在内。1945年7月中美英发布的《波茨坦公告》重申这一条文，稍后的《日本投降书》表示完全接受。自此，中国完全收复了被日本占去的固有领土，从而奠定了现有的疆域版图。历经近代的领土沦丧和抗战以后的失而复得，中国人民心中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领土观念：不是自己的，绝不觊觎；是自己的，绝不放弃。

第四，抗战后期兴起的民主宪政运动，奠定了中国现代政党制度的架构。近代民族主义有两个面向：一是对外反抗，二是对内建设。抗战时期流行的“抗战建国”就是其典型写照。但对于如何建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主张并不一致。抗战后期，中国出现各方竞言“民主”的潮流。中共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相号召，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此间成立的各民主党派则主张实行“民主宪政”。尽管三者背后的意蕴大相径庭，但最终在1946年2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实现了交集和融合。然而，其中的分歧和矛盾难以在具体操作层面“协商”，历史最终作出选择。1949年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60多年来，历经曲折和增益，如今这一政党制度日益表现出蓬勃活力和独特优势。

第五，产生了抗战文化，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军事思想得以丰富，出现无数以抗战为内容的文艺作品，形成丰富的抗战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自此，抗日战争一方面持续不断地形塑着中国的学术研究、国民教育、图书出版和影视文学等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作为永久的历史记忆，又以各种形式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最为典型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常荡漾回响在各种庄严肃穆的场合。每年的9月18日、7月7日、9月3日，中国社会各界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抗战作为一种话题不时出现在中国人的历史怀想和现实言说之中。全国不计其数的抗战遗迹则作为一种物质存在，显示出抗战的永久性和日常性影响。因为抗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便不同了。

灾难与牺牲，光荣与梦想，共同交织于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要全面总结和继承抗战遗产，以慰藉英灵和先人，并启示今人为建设一个美好和平的中国与世界而努力不懈！

